

# 维克托·戈尔德施密特与让·马利科 对卢梭之个体、集体和极权的阐述

[法]卡特琳娜·拉布罗 著  
欧瑜 译

让·凯尔布拉(Jean Kerbrat),生于1939年的当代艺术家,曾制作了一个名为“Audran I”的装置:一个类似不锈钢圆形废纸篓的容器,倾斜得似乎一阵风就能把它吹倒。容器外缘上写着这样的语句:“我们威胁威胁我们的。颠覆并非单向而行。”

这句话在众多领域的适用引人制胜,社会领域一如文学和哲学批评领域。现代公民社会自身产生出贫穷并声称通过防预机制将之疏导,由此产生出这些社会理应包容的这许多排斥,恰恰给了归于社会一己之责的被排斥对象反叛的理由。

换一个没那么戏剧化的调子,文学和哲学批评的调子,不也一样吗?当文学和哲学批评声称对备受争议的文化著作满怀敬意却对这些其声称要还其本来面目的作品出言不逊,这些评论本身不是令作品愈发混沌不清吗?当我们将此疑问加诸对卢梭政治著作理解的一个敏感点,即卢氏宣称的极权上时,这个疑问就完全有的放矢了。实际上,20世纪卢梭主义者的批评具有这样一个惯例,它部分或全部地构成了卢梭著作中极权主义的根源。应该注意的是,这一对极权主义的控诉从20世纪的政治运动向传统经典著作转移的事实,并非为卢梭主义者批评所独有。这种转移更以一种